

当然，现在讨论全球史观对中国史已经和能够产生什么样的影响还为时过早。全球史观给我们提供了一种视野空前开阔、思维空前开放的看待历史的全新视角与方法，它所致力于通过跨学科、长时段、全方位地探讨和关注人类生活层面的相互联系与互动，尤其是关注跨越地域和种族的互动与交流，诸如人口的迁移、疾病的传播、帝国的扩张、生物的交流、技术的转移、思想、观念和信仰的传播以及自然生态环境的变迁等等问题，都是我们在以往的中国史研究中所忽略的一些重要历史现象。如果我们能够真正将全球史观应用和贯穿到中国史研究当中，那将为我们的研究范式带来重大改观。

全球史及其多元潜力*^①

德国雅各布斯大学历史系及亚太研究所教授 多米尼克·塞森麦尔

一、构思全球史的当地研究方法

世界上的很多地方对全球和跨国史学越来越有兴趣。^① 从中国到美国、从阿根廷到欧洲，许多国家或地区的相关研究呈现出各种新的令人感兴趣的方向。^② 像其他学科一样，全球历史研究也体现出学者之间进行各种模式的跨国合作的特点。近些年来该领域出现了很多国际会议、跨文化研究项目和交流项目。

但是，如果认为世界上全球历史的道路和模式在很大程度上逐渐趋同，这是错误的。我们不应该急于得出这样的结论，即西方学术主导了该领域，对全球历史越来越多的兴趣意味着继续传播美欧对世界过去的看法。相反，逐渐兴起的不是一个同质的“全球史”：在该领域有很多学者和不同的理论研究方法。也许更重要的是，全球史的研究视角仍然受到当地因素的极大影响。在中国、德国或者英国等地对该领域的讨论没有变得彼此相同。

毋庸置疑，世界上各个地方都有多元的史学文化，我们绝不应该认为一个国家内部存在单一的史学学派。在大部分国家，全球历史研究的特点是相互竞争的观点、热烈的讨论和多样化的视角。然而，尽管存在上述内部差异，我们仍然能够清楚地看到国家或者地区学术体系之间的差异是存在的。如同很多国际会议告诉我们的那样，世界不同地区的历史学家倾向于采用不同的方法来研究全球历史问题。比如，因为各种原因，“现代性”和“现代化”这两个概念在中国的大部分世界史和全球史学术中占有重要地位。与之相比，美国的大部分历史学家在从国家和跨国层面来分析变化时，实际上开始回避使用“现代化”这个概念工具。^③

① * 感谢首都师范大学全球史研究中心的博士研究生李俊姝和王玖玖把本文译为中文。

① 如何区分一些术语如“全球历史”、“跨国历史”，甚至更早使用的领域名称“世界历史”，这个问题非常难说清楚。就个人而言，笔者认为我们无法在概念上区分这些研究领域，而需要把他们看作是相互联系的，原因是很多历史学家把这三个术语相互交换着使用。

② 参见 Patrick Manning, ed., *Global Practice in World History: Advances Worldwide*, Princeton: Markus Wiener Publishers, 2008.

③ 参见 Dominic Sachsenmaier, “Conceptions of Space in Global History: A Brief Outlook on Research in the United States and China,” *Comparativ. Zeitschrift für Globalgeschichte und Vergleichende Gesellschaftsforschung*, vol. 20, no. 6, 2011, pp. 80-93.

显而易见,这种差异不能简单地用所谓的连续不断的认识论传统来解释。在所有的国家,当今学术机构的历史研究很大程度上是全球转变的结果,而全球转变典型地与世界范围内民族国家的兴起紧密相关。^①作为这些转变的一部分,历史学术研究在很多国家经历了极大的概念上和制度上的变化。这些变化的意义非常重大,大多数情况下我们不能把以前的现代“世界历史”史学到目前的全球历史学术研究简单地用一条直线连接起来。虽然如此,史学从未发展成这样一种学科,即全世界的研究方法都大致相同,如同自然科学一样。一系列因素仍然在限定着全球历史在世界不同地区的研究方法和研究重点,从制度安排和资金结构到社会条件、历史记忆的形式和政治架构都存在这些因素。

因此,如果认为全球历史研究中的当地差异是中国和美国之间的“发展”鸿沟造成的,这是错误的。毕竟,这意味着中国的全球历史研究最终会趋近太平洋彼岸占主导地位的概念和研究方法。笔者相信全球历史研究视角的当地差异会继续存在,甚至将来可能会进一步加重。原因是我们正在朝着一个更加多极化的世界迈进,在这个多极化的世界中,学术领域内的欧洲中心论角度也许将会逐渐淡化。中国和其他西方之外的国家的研究型大学有着越来越重要的地位,也许会改变在19世纪和20世纪的大部分时间内很多学术领域的全球知识等级的分布。

然而,就目前而言,全球历史研究中当地特色的研究状况仍然嵌入西方主导的学术体系中。在我们这个领域,全球知识等级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例如,以英语为母语的历史学家仍然可以轻易地忽视其他语言生产出的学术成果,而在世界其他地区明显不是对等的情况。在很多国家,如从智利到日本,很少有历史学家能够在不考虑美国或英国最相关的文献(要么是通过翻译要么是通过阅读英文相关文本)的情况下,在相关的研究领域内开始自己的职业生涯,这是极其明显的现象。但是,在西方没有太多的学者注意到中国、日本、阿拉伯或者其他地区新兴的世界历史研究方法,即使可以获取相关的翻译版本。

在笔者看来,很多西方的全球史学家更感兴趣的是非西方的历史,而不是当前的非西方史学,这一点很糟糕。也就是说,很多全球史学家没有对世界其他地区的同仁在同一领域所做出的贡献给予足够的关注。笔者感觉这是很重要的问题,因为北美和欧洲内部关于全球史的讨论主要局限于在西方任教的学者。与之相反,世界其他地区的历史研究者首先熟悉自身的文化领域,其次熟悉西方的经验。他们具备从两个不同的参考空间从事研究的优势。

笔者确信,只有世界范围内的历史学家持续不断地讨论上文提到的知识等级,全球史才能真正地展现出其内在的潜力。毕竟,欧洲中心论的传统话题应该从各种不同的角度来研究和讨论。同样的情况也适用于很多其他的话题,如殖民主义历史、研究全球和当地的力量如何相互作用。只有到那时,全球史研究才有希望为探讨全球时代人类共同的责任和危机问题的论坛和公共领域做出贡献。

二、比较西方内部的全球史研究

我们对全球历史的理解在不断多元化,解构相当单一的“西方史学”这个概念是一个重要环节。毕竟,欧洲和美国内部不同社会和地区之间在史学背景方面存在着很大差异。在西方内部解释这些差异的一个好方法是简略地描述美国和德国的全球历史背景。尽管这两个社会和经

^① 关于现代史学的全球历史角度,请参见 Daniel Woolf, *A Global History of Histor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1; Georg G. Iggers, Q. Edward Wang and Supriya Mukherjee, *A Global History of Modern Historiography*.

济体长期以来已经与全球紧密相连（虽然联系的方式不尽相同），但是与德国相比，全球历史和跨国历史在美国扮演着不同的然而更重要的角色。关于德国和美国的全球和跨国历史研究的多样化背景，可以谈论的内容有很多。在下文，笔者将主要比较这两个国家的制度和社会发展以何种方式影响了全球历史研究。

在美国，全球历史的最新发展需要置于此前大学校园里的社会文化变化的语境中来理解。这些变化从 1960 年代开始。在此期间，美国全球地位的提高和扩张的雄心为持续增加研究非西方地区的资助提供了基础。地区研究如中国研究或者非洲研究受到了美国政府和私人基金会的大力支持，主要目标是为适应国家的新的国际活动和扩张的需要训练一批专家。^① 后来，这也引起了很多学科设置的变化，比如史学、政治科学：很多院系开始系统地设立教师职位，包括研究世界其他地区的地区专家。结果，美国历史系的教师比例由原先的主要是北美和欧洲的专家降低到了 66%，在研究型大学这个比例甚至更低。^②

在与其他因素的共同作用下，这种结构上的变化对世界历史和国家历史研究中的叙事产生了更大的压力。越来越多的学者关注欧洲和北美之外的地区，他们也越来越相信自己的任务是打破自己研究中原先存在的种种限制和藩篱。例如，在美国，对研究中国、印度或者中东等世界不同地区的美国学术研究体现出来的欧洲中心主义，一些有影响力的历史学家提出了质疑。与此相关联的是，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挑战各自领域内原先被广泛接受的认识论主张和研究程序。^③

美国大学里地区研究专业的变化只是那个时期美国学术界经历的大转变中的一个方面。美国的高等教育机构在同一时期极大地膨胀了，部分也反映了冷战期间的地理政治角色。^④ 这个过程促进了教师和学生在社会和文化背景方面的多样化，同时也影响了研究和教学安排。尽管教师的数量从 1970 年代以来没有继续大量增长，但是美国大学开始经历一场社会变革，学生的种族、性别和社会背景的多样化程度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水平。^⑤ 这些变化的结果是先前占绝对主导地位“男性白种人”群体目前在的历史系只能占有略超过一半的职位。^⑥

这些社会变化以及美国大学里地区研究逐渐增多，在那时期受到了政治运动的影响——从民权运动到反对越南战争的抗议。所有这些都进一步推进了史学领域的变化。^⑦ 实际上，历史系

① 参见 Immanuel Wallerstein, ed., *Open the Social Sciences: Report of the Gulbenkian Commission on the Restructuring of the Social Sciences*,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6.

② 参见 Robert B. Townsend, "The State of the History Department: A Report on the 1999 Department Survey," *Perspectives on History*, vol. 39, no. 8, 2001; Marcus Gräser, "World History in a Nation-State: The Transnational Disposition in Historical Writing in the United States," *Journal of American History*, vol. 95, 2009, pp. 1038-1052.

③ 参见 Bruce Cumings, "Boundary Displacement: Area Studies and International Studies during and after the Cold War," in Christopher Simpson, ed., *Universities and Empire: Money and Politics in the Social Sciences during the Cold War*, New York: New Press, 1998, pp. 159-188.

④ 参见 Thomas Bender, "Politics, Intellect, and the American University, 1945-1995," *Daedalus*, vol. 126, 1997, pp. 1-38.

⑤ 参见 John Higham, *History: Professional Scholarship in America*, 2nd ed., Baltimor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89.

⑥ 参见 Robert B. Townsend, "The Status of Women and Minorities in the History Profession, 2008," *Perspectives on History*, vol. 46, no. 6 (September 2008).

⑦ 参见 Peter Novick, *That Noble Dream: The "Objectivity Question" and the American Historical Profession*,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8.

是重大论辩的据点,^①很多学者和教师对美国国家历史和世界历史使用的所谓的同质研究方法进行了越来越激烈的批评。在冷战的后半期,越来越多的学者和公共知识分子开始认为学术界的史学主流没有公平对待本国的多样性。^②很多倡导底层研究的群体在美国大学内部逐渐有极大的代表性,他们经常为了身份认同或者政治目标而联合起来,从而受到关注。^③还有其他的学术发展运动,如日益增多的研究领域,从性别研究到非裔美国人研究,通过提出“谁的历史?”这样的问题开始更加猛烈地挑战美国历史的统一性。也就是说,他们关注那些不能简单用主流词汇来描述的经验 and 群体,以反对主流的研究模式。

随之而来的是,美国的大学成为批判西方中心论的重要阵地。底层研究、后殖民主义和后现代主义这些学术潮流,都持有某种反霸权主义理念。在美国这也许仍只是少数人的话语,但是与西方其他地区相比,它们的体制基础要强大得多,并且对学术活动的影响通常也大得多。^④在与许多其他因素共同作用下,这些发展对美国最近的全球史潮流产生了持续的影响,美国近来的全球史潮流建立在史学所有分支中的细节研究基础之上,从经济史到社会史、从性别史到环境史,等等。^⑤大体而言,活跃于这一领域的历史学家中,已有很多学者受到训练,成为西方之外的地区史研究专家,比如中国、印度、非洲或拉美。此外,上文提到在区域研究中存在批判性讨论使美国很多全球史史学家开始公开批评欧洲中心主义和国别的藩篱。

与美国的情况相比,德国史学的学术景象大为不同。在过去数十年中,德国历史学教授的性别和阶层背景更加多样化,但是有外国血统的历史学家在大学里仍只是极少数。也许更重要的是,不到5%的历史教授属于“非欧洲历史专家”。对非洲、亚洲、美洲和中东等非欧洲世界的研究,大多被归入次一级的、专门的小领域,比如伊斯兰研究或者汉学。但是,时至今日,这些“小学科”也倾向于发展他们自己的学术训练形式,同时也有独立的期刊、会议和学会等。基于以上原因,在德国,大量的地区研究仍然保持着碎片化的状态。^⑥

自1920年代以来,德国大学历史系中的地区史研究格局未发生显著的变化。也就是说,尽管20世纪上半叶,德国造成了对全球范围的伤害,也承担了其他重要的全球角色,但德国的学术体系长久以来仍继续边缘化非欧洲和跨文化的历史。这并非是战前国家主义思想的继续,而是在战后向西方靠拢的精神导向下努力接受德国历史的黑暗面的结果,这正是德国历史学界局限于国家范围或欧洲化取向的主要原因。例如1960年代和1970年代的战后第一代历史学家仍决

① Victoria E. Bonnell and Lynn Hunt, eds., *Beyond the Cultural Turn: New Directions in the Study of Society and Culture*,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9.

② 参见一部非常有影响力的作品, Howard Zinn, *A People's History of the United States: 1492-Present*, New York: Harper Collins, 1980.

③ Michael N. Bastedo, "Curriculum in Higher Education: The Historical Roots of Contemporary Issues," in Philip G. Altbach, Patricia J. Gumpert and Robert O. Berdahl, eds., *American Higher Education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Social, Political, and Economic Challenges*, Baltimor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2005, pp. 462-485.

④ 例如,关于这个课题有一个批判性的叙述。François Cusset, *French Theory: How Foucault, Derrida, Deleuze, & Co. Transformed the Intellectual Life of the United States*,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2008.

⑤ 参见 Dominic Sachsenmaier, *Global Perspectives on Global History: Theories and Approaches in a Connected World*,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1, Chapter 2.

⑥ 参见 Dominic Sachsenmaier, *Global Perspectives on Global History: Theories and Approaches in a Connected World*.

然致力于国家史研究，尽管他们极力批判德国的国家主义。^①但是关注国家历史（忽略全球和跨国历史）是他们需求的一部分，因为他们需要公开承认国家社会主义的国家根源，以及德国因纳粹罪行而需担负的责任。

尽管如此，全球和跨国史研究的新形式，尤其自 1990 年代后期以来，在德国历史学家学会中越来越强且备受瞩目。越来越多的跨学科研究中心和学术网络受到了德国基金会的大力支持，这为历史学家之间和区域研究（比如亚洲研究或者非洲研究）之间的合作创造了更多的机会。结果，越来越多的史学研究生接受过至少一门非西方地区史的学术训练。德国历史学家日益倾向于寻找新的方法发掘德国和欧洲历史的全球和跨国维度，并且摒弃了以欧洲为中心的主导叙事方法。

在其他众多话题中，殖民主义研究尤其成为历史学家和区域研究学者彼此交流及从事共同研究的、为数不多的领域之一，并出现了几个有趣的研究方向。例如，有些历史学家将希特勒对东欧国家的入侵也纳入殖民行为，由此拓宽了德国殖民主义的概念。^②此外，近来的研究还证实了后来的某些方案其实早在德国殖民时期就已拟定，比如通过优生学、或强制被认为是多余的人口迁居的方式来净化社会的想法。^③再者，也出现了对某些问题的公开探讨，比如德国殖民统治之下所发生的暴行等问题。

总体来说，对殖民史研究新形式日益增长的兴趣，与试图从跨国视角重写现代德国历史的尝试关系密切。^④在众多外部因素的影响下，越来越需要从全球和跨国视角看待德国历史。例如，来自土耳其和其他国家的移民潮使德国社会呈现明显的多元化，这让很多历史学家意识到也应将跨文化视角应用到德国历史研究中来。这种尝试包括从离散社群网络的视角研究土耳其裔德国人或其他少数族裔。这意味着将土耳其裔德国人视为德国社会固有的组成部分，同时也更多地关注这些人与土耳其或者其他国家之间持久的关系。

德国在这过去的十年中，除了这些更为专业的领域外，长期以来处于边缘地位的宏观世界史也经历了明显的复兴。目前有越来越多的著作为读者呈现了看待长时段的全球史维度。^⑤德国全球史领域中一个重大的里程碑式事件是尤尔根·奥斯特哈梅尔（Jürgen Osterhammel）的著作《世界的变革》（*Die Verwandlung der Welt*）的出版，该书 1500 余页，所列参考书目超过 2500 本。^⑥这部著作以全球史的视角看待 19 世纪，但该书既没有采用普通的分期方式，也没有采用一成不变的空间概念。作者转而强调以特有的年表和地理环境为特征的各不相同的历史进程。同时，奥斯特哈梅尔也认为大量的“长期进程”是 19 世纪大部分时间的特点，比如西方中心论的

① 参见 Dominic Sachsenmaier, *Global Perspectives on Global History: Theories and Approaches in a Connected World*.

② 例如，Dirk van Laak, *Über alles in der Welt: Deutscher Imperialismus im 19. und 20. Jahrhundert*, München: C. H. Beck, 2005.

③ 例如，Birthe Kundrus, *Moderne Imperialisten: Das Kaiserreich im Spiegel seiner Kolonien*, Köln: Böhlau, 2003. 总体而言，该研究借鉴了汉娜·阿伦特《极权主义的起源》一书的框架，该书明显的特点是跨越国家范围。但是，当前的历史研究很大程度上是基于一手材料的分析。

④ 例如，Sebastian Conrad, *Globalisierung und Nation im Deutschen Kaiserreich*, München: C. H. Beck, 2006.

⑤ 其中一例是“Global History-The World, 1000-2000”系列研究，其中 8 卷是对过去一千年全球历史的记述。

⑥ Jürgen Osterhammel, *Die Verwandlung der Welt: Eine Geschichte des 19. Jahrhunderts*, München: C. H. Beck, 2009. 英文版即将由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出版。

某些方面受到强化，因交通技术的变革世界各地相互之间的联系日益紧密。奥斯特哈梅尔的著作对史学和普通大众都产生重要的影响。该书出版后不久，德国各大报纸和学术杂志便给予了广泛的评论，将其誉为德国史学领域的里程碑。从这个意义上讲，可以将该书的出版视为德国学术体系内全球史著作的地位渐增的迹象或者象征性事件。

三、对未来研究的启示

对德国和美国的全球史学术界简要的概述表明，每个国家特有的要素，比如院系结构和历史记忆模式等，是如何影响地方层面全球史研究的不同方法的。对当前这代历史学家来说，他们的任务是促进不同的学术传统和全球史定义、方法间的对话。到目前为止，有些国家的学术体系仍然处于相当孤立的状态，这些国家的历史学家更应该在全球史领域建立学术网络。在过去的数十年里，英美的大学扮演了全球学术中心的角色。全球史研究和论辩的情况很大程度上将受益于其他的网络格局。无论如何，世界各地的历史学家在方法论上的密切切磋，不仅能够为全球史研究提供批判性对话，还能促进不同地区专门史研究方法间的相互影响。目前，很多全球历史问题的学术定位仍然是多样化的，因此关于这些问题的对话必定会促进关于学术价值、认识论前提以及世界观等问题的广泛讨论。

然而，当前历史学界处于各自孤军奋战的状态，这至少无法很好地支持一些全球和跨国史的学术课题。如果史学想要进一步把握世界范围内的学科情况和观点、看法——至少是通过论坛的形式，那么应该加强团队合作的尝试。例如，设想一下：来自世界各地的不同的专家共同合作，设计出一系列共同的问题和方法论框架。每个成员都以这个商定的研究方法为指导，作为一种方法论主线，贯穿在自己的详尽的原始资料和背景研究的工作中。毋庸置疑，如同单个的作者一样，一个研究团体也需要慢慢地总结出它的总体性方法，提炼出一套核心问题并将其与之前没有考虑到的错综复杂的问题协调起来。我们有必要进入到一种动态过程中，在此过程中，随着从具体研究领域中获得新观点，方法论框架将不断得到发展。为了协商彼此的不同意见，这个团体应该定期安排会面，只有这样，上述计划才可以实现。这对于国际合作尤其具有挑战性，因为必须有可用的基金支持才行。

虽然全球史研究的前景看起来很诱人，但真正实行团体研究却要付出一定的代价。比如，存在历史叙事以及原创作者的问题。还有一个问题，这甚至可能是那些年轻学者更关注的问题，即学术奖励体系无法公平对待集体合作。如此说来，国际合作出版的著作有可能只是某些个人研究项目的副产品。然而这些作品具有极大的潜力。我们不应天真地认为加深跨国学术接触是万能的，但是，如果没有目前日益扩大的跨国学术合作或不去进行新的合作，那么我们无法想象如何去应对全球史学术界未来必须要面对的基本挑战。

（责任编辑：舒建军 责任编辑：姚玉民）